

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集美)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

王 爱 平

(华侨大学 华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21)

[作者简介] 王爱平(1953-), 女, 河南虞城人,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集美)副教授, 厦门大学博士生, 主要从事华侨华人和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摘 要] 依据对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 探讨印尼华裔青少年一代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问题。研究表明, 所调查的印尼华裔青少年均已完全认同印度尼西亚国家, 但是印尼长期推行歧视、排斥华人政策极大地挫伤了这种感情归属。他们有着强烈的华人身份认同意识, 对融入印尼当地社会持积极的态度, 并期望与印尼主体民族拥有同等的待

[关键词] 195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72-1520(2006)02-0282-07

1998年, 华人数居世界各国之首的印度尼西亚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排华暴乱, 印尼华人问题遂为国际社会所关注。众所周知, 自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 印尼苏哈托政府对华人全面推行强制同化政策, 并且很明确地把清除华人的文化特性作为其同化政策的重点。30多年过去了, 在全面强制同化时期成长起来的印尼华裔青少年一代是否已经被同化? 他们如何认识自己的身份? 他们有着怎样的认同? 近年来我们开展了对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印尼华裔学生的调查研究, 试图通过对这一特定群体的调查, 具体探讨印尼华裔青少年一代的语言、文化现状以及他们的认同问题。因篇幅所限, 分作系列论文报告调查研究的初步成果, 本文将考察分析印尼华裔学生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

一、调查研究的内容与基本情况

认同(Identity)是近年来华侨华人研究中普遍使用的概念, 这一源于心理学的术语, 现已相当广泛地为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者所运用。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 随着世界范围的经济、传媒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运动两股浪潮的兴起, “认同”问题更是成为人们注目的热点。人类总是生活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1](第6页)中, “认同”可说是这个“意义之网”的一个重要部分。本文使用“认同”这一概念以表示个人或群体的“归属感”, 即: 个人或群体(行为的主体)与主体以外的对象(即客体, 包括个人、团体、观念、理想及事物等)之间, 产生心理上、感情上的结合关系, 结果在潜意识中, 将自己视为对象(客

体)的一部分而行动^[2](第1页)。

著名华裔学者王赓武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东南亚华人多重身份认同的理论,并提出研究种族、国家、阶级、文化等的多重认同规范、标准^[3](第252-253页)。厦门大学庄国土教授近年提出,可将东南亚华人的认同分为政治(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两大类,认为其他各种认同都可以归于这两类^[4](第64页)。并进一步指出,在华人族群认同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族群文化意识,高度表现为自我的华人意识(Chineseness)。华人意识,即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华人的意识,日益成为东南亚华人认同的基础^[5](第40页)。但是,在华人族群的多元认同中,“政治上的国家认同是诸认同中起支配作用者。相对于其他认同,国家认同具有强制性。这种强制性不但表现在作为个体的公民政治上必须认同于国家,而且表现在国家能通过各种法规与强制力规范公民的政治、社区、经济和文化活动”^[4](第65页)。著名马来西亚华裔学者陈志明(Tan Chee Beng)教授提出,研究族群认同,可将族群认同分为三个组成部分来分析:一是族群的名称;二是族群意识(族群的自我认同以及这种认同的经验);三是客观的族群认同表现(如语言、服饰、习俗等等)。并且提出应首先调查了解一个族群的自我认同,即人们的族群意识^[6](第48页)。

我们对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认同研究,首先注重调查他们在语言、文化上“客观的族群认同表现”;同时也注重了解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即注意考察分析他们的华人意识;以及“在诸认同中起支配作用”的国家认同问题。

华侨大学华文学院的前身为陈嘉庚先生所创办的厦门集美华侨补习学校以及20世纪80年代成立的集美中国语言文化学校,每年均有大量东南亚华裔学生入校学习汉语,近年来印尼学生人数高居各国学生之首。特别是印尼排华暴乱发生的1998年,大批印尼华裔青少年涌入,可说是一种带有“避难”性质的留学。我们采用了问卷与观察、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和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7](第24-25页),并将调查对象加以扩大,同时利用赴印尼教授汉语的机会在雅加达、泗水和巴厘岛的华人中进行了有关的调查。

从1999年下半年到2003年12月,我们先后对278位印尼华裔学生,156位非华裔留学生和其他国家华裔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印尼华裔学生246份有效问卷中(对一些年龄较大的学员,不作为“青少年”统计分析),男生96人,占39%;女生150人,占61%。其中:一年级133人,占54%;二年级89人,占36%;本科三、四年级25人,占10%。全部出生于1965年“九·三零”事件之后。年龄最小的为11岁(1990年出生。按调查时的年龄计算,下同);年龄最大的为34岁(1968年出生)。来中国学习前的最后学历,大学及以上101人,占41%;高中生111人,占45%;初中生22人,占9%;未填写12人,占5%。

在印尼的居住地,分布在印尼最大的四个岛屿: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苏拉威西以及著名的巴厘岛。大都居住在雅加达、棉兰、巨港、万隆、泗水、三宝壟、坤甸、占碑、乌戎潘当、锡江等大中城市及附近的小城市,均是华人聚居的地方。家庭从事职业:父亲从事工商业者占91%,祖父从事工商业者为47%(部分学生因祖父已过世而未填写此项)。

二、自我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

印尼华裔青少年一代对自己的身份究竟怎样看?他们的国家意识、归属倾向如何?关于这一主题,问卷中设问:“你认为自己是:印尼人?华侨(中国人)?华人?说不清楚?”(填答要求:如果认为有必要,可以选2项。)初开始调查时,问卷中并未设“说不清楚”这一选项。是学生们主动向我们谈起自己的痛苦与困惑:为什么我们在印尼出生、长大,拿着印尼的国籍证,但在印尼说我们是中国人?到了中国又说我们是印尼人?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说不清楚!他们要求加上这一选项。

统计显示,有73%的印尼华裔学生认为自己是“华人”。这一数据说明:这些印尼华裔青少年已经基本上脱离了华侨意识,已经明确建立了对印度尼西亚国家的认同;同时也表明他们大部分人的华人身份认同意识十分明确。但是表示“说不清楚”的比例比较高。

本来,印尼华人对自己的身份是十分清楚、明确的,他们甚至以 Orang Tionghua(中华人)相对于 Orang China(中国人)来强调当地华人的认同。Tionghua 是闽南话“中华”的音译,Orang 是印尼语“人”的意思。他们自称为 Orang Tionghua,即华人。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人对自己的身份“说不清楚”?我们发现将统计结果从两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对一些问题看得更清楚。

第一,1999—2000 年上半年与 2003 年的调查统计结果相比有明显的差异。

表 1 印尼华裔学生 1999-2000 年与 2003 年身份认同统计比较 %

时间	身 份			
	印尼人	华侨(中国人)	华人	说不清楚
1999—2000 年上半年	0	3	67	28
2003 年	2.5	2.5	80	12.5

上表显示出 1999-2000 年对自己的身份“说不清楚”的高达 28%,2003 年下降为 12.5%,认为是“华人”的比例上升为 80%。访谈调查了解到,是印尼政府对华人长期实行强制同化的政策以及 1998 年发生的那场排华暴乱,极大地挫伤了他们对印尼国家的感情,且造成了他们对自己身份认同的困惑和痛苦。1999—2000 年调查时,排华暴乱发生不久,他们深受刺激,心有余悸。2003 年的数据则反映出瓦西德总统、梅加瓦蒂总统执政期间善待华人的政策在华裔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华人认同意识上迅速产生了影响。

表 1 显示,自认为是印尼人的人数很少,大多数仅填写自己是华人。他们说,这是因为印尼国家一直不把印尼华人看作印尼人。有一对家住雅加达的双胞胎姐弟,1998 年暴乱中,家里的工厂、商店被毁,他们当时才 12 岁,被送到集美一年多后回印尼,2004 年又一起来学汉语。弟弟在问卷中写道:如果是一个印尼原住民,最大的好处就是“对于国籍的事不用伤脑筋。”“我们很爱国家,但是却不能全心全意对国家忠诚。”“他们(指印尼原住民)有自己的国家,印尼华人没有自己的国家。”一位填写印尼人和华人两项的学生说,他认为印尼华人应该是同原住民平等的印尼人,政府不把印尼华人当作印尼人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不仅要写上华人,而且一定要写上自己是印尼人。由此可见,国家认同是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年轻一代的印尼华人强调与印尼原住民的平等权利,批评政府歧视、排斥华人的政策,是与他们对印尼国家的认同息息相关的。无论强调自己是华人,还是印尼人,他们都认同印度尼西亚国家,他们是以印尼公民的身份向印尼国家要求平等的权利。

有少数印尼华裔学生自认为是“华侨”。但实际上他们全部是印尼国籍。访谈中了解到有些学生的父亲由于种种原因至今仍未加入印尼国籍,这些同学说,“我爸爸是中国人,我也应该是中国人。”对此似可理解为他们对于父辈所属的、并能为他们提供避难处所的祖籍国——中国所产生的亲近之情。

第二,印尼华裔学生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与菲律宾、泰国华裔学生相比有明显的差异。

表 2 菲律宾、泰国华裔学生身份认同统计 %

国家	身 份			
	所在国人	华侨(中国人)	华人	说不清楚
菲律宾	82	0	85	0
泰国	76	0	56	0

表 2 可以看出,菲、泰两国学生无一人对自己的身份“说不清楚”。菲律宾学生填写“菲律宾人”与“华人”的数量均在 80%以上,且相差不大。这说明同时选择 2 项,自认为是“菲律宾华人”者比较多,他们比较强调自己是“菲律宾”的华人。泰国华裔学生认为自己是“泰国人”的要比“华人”高出 20%,这意味着至少有 20%的华裔学生仅仅选择了是“泰国人”,而没有选择“华人”,这可以理解为至少有 20%的泰国华裔学生认为自己是泰国人最重要,是不是华人已不重要。

将表 2 与表 1 的数据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菲、泰两国的华裔学生比印尼华裔学生有着更为强烈的所在国的国民意识,亦即对所在国的认同意识。对此应理解为,国家的华人政策强有力地影响着华裔青少年的认同意识,这与菲、泰两国采取了与印尼不同的华人政策有关。泰国采取宽待华人的政策,泰

国华人长期以来就落地生根,融入泰国社会。菲律宾华侨也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大部分入籍,目前已基本上享有平等的权利。而印尼华侨迟至20世纪80年代初才解决入籍问题并且一直受到歧视和排斥。正如陈玉兰(Mely G. Tan)博士所指出的,印尼政府排华政策的长期施行,“让大多数自认是印尼人但却不断受到提醒他们是华裔、或是和印尼人不同的华人感到挫折”^[8](第59页),印尼政府的排华政策实际上“促成”了华人的“华人身份认同”。

瓦西德总统、梅加瓦蒂总统执政期间施行的善待华人的政策在华裔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华人认同意识上迅速产生了影响,还可观察到大量说明问题的事例。2001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年会在上海召开时,一位印尼华裔男生举着印有梅加瓦蒂总统大幅彩照的《厦门日报》,兴奋地对笔者说:“老师,看!我们的总统!”2004年7月2日,有60多位印尼华裔学生在集美严肃认真地参加总统直选,他们自己设立投票箱,推举负责人,仔细阅读领事馆寄来的材料和选票,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与身份认同相关的还有中文姓名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为根深蒂固的血统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姓氏制度。一般来说,愿意保留华人特性的华人都极为重视自己的祖姓。正因为此,要求华人改换姓名也成为印尼政府长期推行的强制同化政策的一项重要措施。正如廖建裕(Leo Suryadinata)教授所指出的,1966年12月印尼政府发布的改名换姓法令是“冲淡华人身份认同最重要的措施”^[9](第123页)。华裔学生如何看待自己的中文姓名,这与他们的自我认同意识有密切的关系。

调查中发现,95%的华裔学生是刚一出生就取了中文名字。他们的中文名字,许多是福建、广东一带传统的取名习惯用字,也有一些是带有现代色彩的中国人取名时常用的字。有一些用字明显是中华文化的影响,如春春、秋燕等按照出生的季节而取名,印尼地处赤道附近,是没有四季之分的;还有用烜、瑄等现在很少用的表示尊贵的汉字。他们认为,是华人就应该有一个中文名字,大都能讲出自己名字的涵义和来历,以及自己的中文姓名与印尼文名字的关系。

在法定使用的印尼文姓名中,他们大都设法保留了自己的祖姓。少数是直接将中文姓名音译而成。大多数采用以拉丁字母为其汉语方言读音注音的办法,其中多是按闽南话发音注音,如“陈”姓写为“Tan”;“林”为Lim;“黄”为Wi;“吴”为Gu;“许”为Kon。他们普遍对自己的姓氏怀有浓厚兴趣,二年级有一篇阅读短文讲到中国人的姓氏,列举了人数最多的19个姓,他们看到自己的姓陈、林、黄、吴等列在其中而非常兴奋。上课时使用了一个电脑软件——《百家姓》,他们纷纷查找自己的姓氏,当发现自己的姓氏源远流长,有众多的知名人物时,他们的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这些印尼华裔青少年对中文姓名的保留,在印尼文姓名中对祖姓的保留,即是保留了华人身份的一种表征。他们对自己中文姓名的重视,也表明了对华人身份的认同。

三、祖籍观念与国家认同

祖籍认同与华人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关注自己的祖籍渊源是华人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调查发现,这一批在全面强制同化时期出生、成长起来的印尼华裔青少年对自己的祖籍有相当的了解。大部分人都知道自己的祖籍地。祖籍为福建省(包括金门)的占63%;广东省9%;知道是客家人,但不知是何地的4%;不清楚者24%。有些学生还知道自己的父亲、母亲和祖母各自不同的祖籍故乡。并且有28%的学生曾跟父母或其他长辈到过自己的祖籍故乡。

与此相联系,他们大部分对自己家庭移居印尼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知道自己是移居印尼的第几代人。具体情况为:第二代5%,第三代33%,第四代30%,第五代5%,不清楚者27%。另外,根据访谈调查可以确定,“不清楚”者均为三代以上,甚至有第六或第七代的。考虑到他们之中未成年人占有相当比例,这些数据很能反映出他们比较强烈的华人意识。

其二,设问:“在看体育比赛时,你通常支持那一方?”

1. 印尼队与美国队 印尼 美国 双方

2. 印尼队与日本队	印尼	日本	双方
3. 印尼队与中国队	印尼	中国	双方
4. 中国队与美国队	中国	美国	双方
5. 中国队与日本队	中国	日本	双方

这部分旨在考察印尼华裔青少年在所在国印尼与祖籍国中国之间,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自己倾向于何方,亦即国家认同的归属意识。一般说来,观看体育比赛时倾向哪一方,会较少受到客观的政治环境 and 经济利害制约,可以比较直率地表露出内心的真情实感。

统计结果可见,不论印尼队对中国队,还是对美国队、日本队,他们对印尼队的支持均高居首位。其中,支持印尼队者是支持日本队的 3 倍;是支持美国队的 2.8 倍;是支持中国队的 2.5 倍。这表明印尼华裔青少年一代的感情归属明确地倾向于印尼。中国队对美国队和日本队,支持中国队的均居首位,这表明他们在感情归属印尼国家的同时,对于祖籍国中国也有一定的亲近之情。

而在 1999-2000 年上半年,印尼队对中国队,支持中国队的明显高于支持印尼队(分别是 40% 和 30%),支持双方的占 29%。另外,中国队对美国队、日本队,支持中国队者是支持美国队的 4 倍,是支持日本队的 25 倍。这些似可说明,1998 年的排华暴乱使华裔青少年对印尼国家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而对能及时给他们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生活环境,或说是一个避难场所的祖籍国——中国抱有较强烈的亲情和好感。

还应指出,即便是 2003 年的调查结果,印尼华裔青少年对印尼队的支持率也远远低于菲律宾、泰国华裔学生对本国队的支持。

其三,设问:如果你中奖 500 万美元,你会怎样使用?(是 A;可能 B;否 C)

1. 捐赠一部分为印尼当地做公益事业。2. 捐赠一部分为中国祖籍故乡做公益事业。(以上为 8 个选项中的 2 个,其余 6 个选项为“给父母一部分,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用来做学费,好好学习”等等。)结果表明,表示愿意捐赠一部分为印尼当地做公益事业的人数比例明显高于愿意捐赠一部分为在中国的祖籍故乡做公益事业的(A 加 B:前者 85%,后者 45%)。但是,表示不愿意捐赠给印尼当地的人数比例,也明显高于不愿意捐赠给在中国的祖籍故乡的(分别是 15% 和 7.5%)。

这些意向似显示出,印尼华裔青少年对所在国印尼有着明确的国家认同意识和感情归属,但对印尼国家的感情归属还存在着一定的隔膜;同时也显示出对祖籍国中国有一定的亲近之情。

四、族群关系与族群意识

首先从对族际通婚的态度来考察这一主题。族际通婚可以深刻反映族群关系深层次的状况,“这是因为族群之间的基本差异深植于人们的群体认同之中”,“而每一个人只有对另一个人在感情和心理上都认为‘可以接受’和感到十分亲近的时候,才有可能考虑到与他(她)缔结婚姻的问题”,所以族际通婚可以作为“测量不同族群相互关系和深层次融合程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10] (第 436-437 页)华人与当地民族的通婚情况可反映出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程度,华人对族际通婚的看法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华人对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的意识观念。

设问:如果你兄弟姐妹中有人和当地人(印尼原住民)结婚,你的看法如何?调查结果是:赞成者为 0;反对者占 48%;只要双方相爱就赞成者占 38%;无所谓者占 2%;还有 2% 的人既“反对”,又认为“只要双方相爱就赞成”。在 1999-2000 年的调查中,反对通婚的比例更高,甚至填答“只要双方相爱就赞成”的比例也很低,只有 9%。而菲、泰两国华裔青少年对此问题的填答,表示“无所谓”者占 39%。反对者很少。泰国无一例反对者。

不愿意通婚的主要原因:首先是宗教信仰不同,对伊斯兰教徒难以接受。他们大部分信仰佛教、基督教和天主教(各占 43.9%、28.5% 和 17.9%),也有少数孔教徒(2.8%),而无人信仰伊斯兰教^[11] (第

82页);而印尼原住民大部分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一致认为,印尼的伊斯兰教与华人格格不入并且仇视和排斥华人,而且印尼伊斯兰教规定与伊斯兰教徒结婚者必须改信伊斯兰教,他们表示不能接受。不过,他们也一致认为,印尼大部分伊斯兰教徒对华人是友好的。近两年来有印尼伊斯兰教徒同他们一起来我院学习汉语,他们作为同学相处十分亲密融洽。

其次,“习性”和生活习惯不同,难以在一起生活。他们所说的“习性”涵义深广,是指涉及到人生观、价值观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问题。例如,他们认为,许多印尼原住民对生活没有长远打算,有了钱就要赶快花光;对家庭缺乏责任感,尤其是男性,这些都与华人的想法不同。生活习惯的不同,其中最明显的是吃猪肉的问题。

第三,还发现与族际通婚相联系的一个情况:他们开玩笑时把皮肤比较黑的同学叫做“乌番”(闽南话),并能具体、生动地描述华人的眼睛、肤色等特点以及与印尼原住民的不同之处,表现出一种华人种族外貌特征的优越感。这些种族遗传形成的外貌生理特征,也就是王赓武教授所提出的华人认同中的体质规范(physical norms)^[12](第210页)。这些情况说明,虽然印尼华人在政治上受歧视,但华裔青少年的内心深处仍保有强烈的华人身份的认同意识和优越感。

从上述可以看出,与菲、泰华裔学生相比,印尼华裔学生融入当地主流社会的程度比较差,与当地原住民之间文化上的隔阂还比较深。但是,他们也认为人的感情很重要,“只要双方相爱就赞成”,这反映出年轻一代超越宗教、种族隔阂的爱情第一的婚姻观念。1999-2000年与总的调查数据的较大差异可反映出瓦西德总统、梅加瓦蒂总统执政期间善待华人的政策在华裔青少年的华人意识和族群关系态度上迅速产生了影响。

其二,设问:你是否同意下列看法:1.华人应该和印尼原住民多交朋友。2.华人和印尼原住民交朋友很难。3.华人有钱是靠自己勤奋工作挣来的。4.华人比印尼原住民勤奋、努力。这部分的设问旨在了解印尼华裔青少年对自身族群和当地民族的印象与情感,以及对融入印尼主流社会的态度。

上述第1点同意者92.5%,反对者7.5%,这表明印尼华裔青少年一代对融入印尼当地社会持有积极的、肯定的态度。不少学生和家长们谈到,仇视、排斥华人的印尼原住民仅仅是少数,许多人对华人很友好,并在排华暴乱中保护帮助华人。第2点同意者62.5%,不同意者37.5%。这明显反映出印尼长期推行排华政策在华人与印尼原住民之间造成比较深的隔阂。第3点同意者95%,反对者5%;第4点同意者78%,反对者22%。这可反映出印尼华裔青少年对华人身份的认同以及作为华人在文化上的某种优越感、自豪感,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印尼社会上片面宣传华人有钱,认为华人是剥削者等排华言论的不满与抗争。

综合以上的调查结果与分析,对所调查的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首先,尽管印尼是世界上排华最激烈的国家,但生于斯长于斯的印尼华裔青少年已经明确地认同印尼国家,感情归属明显倾向于印尼。总之,他们已经“落地生根”。但是,印尼政府长期推行的歧视、排斥华人的政策极大地挫伤了华裔青少年的这种感情归属,给许多人造成了身份认同的困惑与痛苦。

第二,尽管苏哈托政府推行全面强制华人同化的政策30余年,但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印尼华裔青少年一代仍有着强烈的华人身份认同意识,对祖籍国——中国仍怀有亲近的感情。

第三,印尼华裔青少年一代对融入印尼当地社会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如果说他们现在表现出更强烈的华人族群情感,对印尼政府的一些政策持强烈的批评态度,那是因为他们作为国家公民已完全认同了印度尼西亚,因此期望能够与印尼主体民族拥有同等的待遇。

第四,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印尼国家的有关法律和政策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支配作用。瓦西德总统、梅加瓦蒂总统执政期间视华人为印尼社会平等一员的多元文化政策,使印尼华裔青少年对印尼国家的认同意识比过去明显增强,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的华人身份认同意识。

最后,应该特别指出,在印度尼西亚这个辽阔的千岛之国,因家庭移居年代、生活地区、从事职业、经济收入以及个人成长环境、经历等等的千差万别,将会造成华人认同意识的极大差别。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已经到中国来学习汉语的华裔青少年,若要更全面地了解印尼华裔青少年的认同问题,还需要对更多的不同群体做更多的调查和研究。我们的调查研究还在继续,殷切期望得到有关专家的指正,以使今后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参 考 文 献]

- [1]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力戈,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 [2] 崔贵强. 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1945—1959[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 [3] 王赓武. 东南亚华人的身份认同与研究[C]. 中国与海外华人. 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
- [4] 庄国土. 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J]. 厦门大学学报,2002, (3).
- [5] 庄国土. 论东南亚的华族[J]. 世界民族,2002, (3).
- [6] 陈志明. 族群的名称与族群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2002, (1).
- [7] 王爱平. 印尼华裔青少年语言与认同的个案分析[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4, (4).
- [8] Mely G. Tan. 印尼之华裔:身份认同问题[C]. 华裔东南亚人. 台北:暨南国际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1998.
- [9] [新]廖建裕. 现阶段的印尼华人族群[M]. 新加坡: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2.
- [10] 马 戎. 民族社会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1] 王爱平. 文化与认同:印尼华裔青少年调查研究[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 (6).
- [12]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M]. Singapore: Time Academic Press, 1991.

(责任编辑 于华东)

Ident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Teenagers of Chinese Descendant in Indonesia

WANG Aip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361021, Fujian, China)

Biography: Wang Aiping (1953-), Associate, Professor,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uaqiao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history of social culture in 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students of Chinese descendents in Indonesia in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of Huaqiao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of teenagers of Chinese descendents in Indonesia. It shows that the polici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against Chinese in Indonesia have injured the teenager's identity feelings, although the teenagers have strong national identity with Indonesia. They enthusiastically get into Indonesia society and look forward to having equality with the main nationalities in Indonesia. These identifi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mentioned above are both changeable courses of identity. The related laws and policies play a critical part in this course. President Wahid and President Megawati's multilateral policies strengthened the Chineseness of teenagers of Chinese descendents in Indonesia .

Key words: identity; identification; national identity; the teenagers of Chinese descendant in Indonesia; Chineseness